



周太玄
(1895—1968)



黄季陆
(1899—1985)



向楚
(1877—1961)



吴贻芳
(1893—1985)



朱白清
(1897—1948)



陈文贵
(1902—1974)



叶心清
(1908—1967)



文藻青
(1885—1958)

(谢霖先生照片因付印时间紧迫未能收集到)



王 善 林
(1894 —)



向 察 鲁
(1895 — 1941)



吴 芳 吉
(1896 — 1932)



余 苍 一
(1880 — 1939)



陈彦衡
(1866—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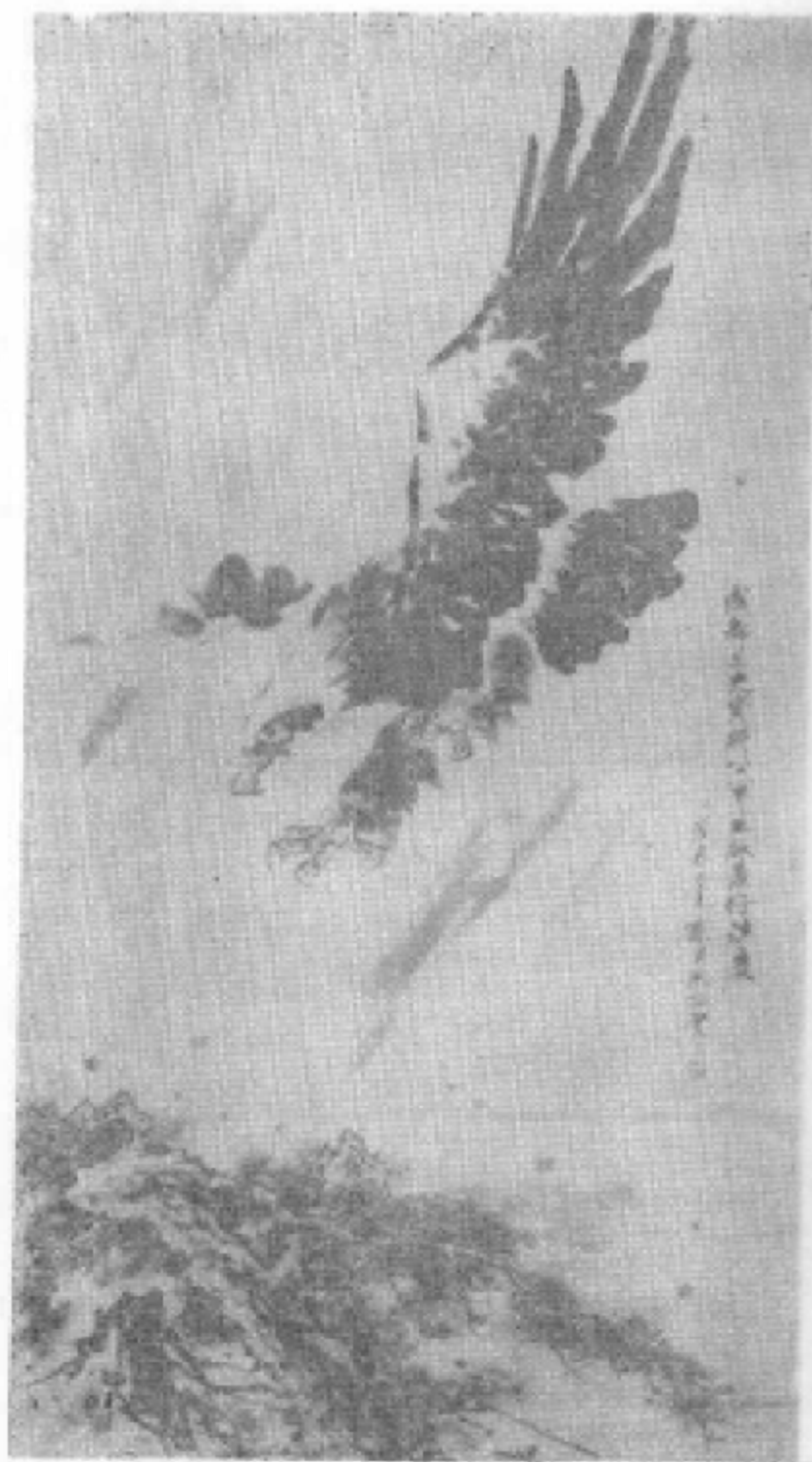
张深吟
(1912—1964)



万从木
(1899—1971)



一九三七年，叶伯和（一八八九至一九四五）与海灯乐社部分同仁为抗战募捐，摄于成都少城公园。前排左三为叶伯和。



文史研究员陈思瀚画

目 录

著名学者、生物学家周太玄	周孟璞 刘恩义 (1)
黄季陆略历及长川大建树	李有为 (12)
前川大文学院院长向楚	向在淦 (27)
先师向仙乔言行忆录	陶亮生 (44)
原金女大校长吴贻芳轶事	肖鼎璘 (48)
文学家朱自清	朱之彦 (55)
细菌学家陈文贵	张义富 (62)
金针神医叶心清	叶成炳 叶成理 (71)
原成都高工校长、电机专家文藻青	李维先 (76)
会计学家谢霖	戴文鼎 喻诚然 (81)
棉花专家王善佺	李忠义 (87)
考据学家向宗鲁	罗元晖 (93)
爱国诗人吴芳吉	罗元晖 (105)
余苍一教授事略	余时敏 (116)
京剧音乐家陈彦衡	陈富年 (119)
音乐教育家叶伯和	周军平 (142)
版画家张漾兮	洪毅然 (149)
原西南美专校长万从木	张义富 (158)

著名学者生物学家周太玄

周孟璞 刘恩义

周太玄，成都市人，原名周焯，号朗宣，后改名周无，号太玄，赴法国留学时起即用太玄而不用其名了。

青年时代的周太玄，积极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早年留学法国，曾获蒙彼利埃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后入巴黎研究院，以卓越的成就获得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他主攻细胞学和腔肠动物研究，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太玄先生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翻译家和诗人。他在担任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和行政领导职务的同时，还孜孜不倦勤于著述、翻译和科学普及工作，为我们编写出版了《生物史之研究》、《动物心理学》等7部关于生物学的重要著作，并翻译出版了《古动物学》、《达尔文以后生物学上诸大问题》、《人的研究》、《人的科学》、《物种》等11部著作，此外还写有大量的生物学论文、科普书籍和有关教育问题、妇女问题和哲学问题的论述及政论、诗论诗作，留传后世。他被誉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通才。

周太玄于1895年1月20日出生在现成都市新都县，他曾这样叙述自己的家世：“我生于一个汉族血统的家族，我们谱系中的世代祖先都是读书人。”父亲周朴臣曾在新都、峨眉等县任典史，因家道贫寒，曾把太玄过继给在四川雷、马、屏（清朝在雷波、马边两县设厅，连同屏山县统属叙州管辖）做县令的兄长，但终不见容于严苛的伯母，父亲去世后不久即被退回家中。这给

注：作者周孟璞系周太玄长子，刘恩义现任成都市文化局《戏剧》主编。

生活在童年的太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创伤，但也种下了一颗强毅奋发的种子，对他性格的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

周太玄在学前即开始诵读《论语》、《诗经》、《唐诗》等，八岁入学后，除语文和科学外，仍以读经、史、诗和做“策论”为主要课程。他一生中时常称道当时的教师杨应麟、林玉峰先生，都是“一时之选”。后来他在石室中学读书时，校长兼历史教师的刘士志先生，又曾对他灌以进步思想影响，在刘先生的指引下，他读到了许多从海外寄来的宣传革命的刊物。他少年时代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就有深厚的造诣并倾向民族民主革命，都为其家学渊源和师长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因而他深深地感念师长们的教诲之功。

周太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高级小学后，1909年（清宣统元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即以后的石室中学前身。他的同学友好中有郭沫若、李劫人、王光祈、魏嗣銓、蒙文通、张怡荪等，都是卓有成就的一代人才。此外，还有后来成为国家主义者的曾琦。郭沫若在他的《反正前后》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王光祈、魏嗣銓、李劫人、周太玄诸人都是我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当时都要算是佼佼者。太玄在诸人之中最年青……，他低我们一班。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他有一位胞兄和我在嘉定府中学堂同过学。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另一位友人也在回忆他的文章中说：太玄“少年颖慧，有学辄通，具美风姿而器度开朗，令人有‘与公瑾交，如饮纯醪，不觉自醉’之感”。这些都是对周太玄才华、性格风貌的真实写照。

当时的《国粹学报》是周太玄最爱读的刊物，其中郑所南、张苍水的诗文，文天祥的“集社”和岳飞的诗词，都曾激动过他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他壮怀激烈，慷慨悲歌，不能自己，直到晚年，对这些诗词仍能琅琅成诵。他在历史课的学习中，开

始了解和思考自己国家民族的兴衰治乱和发展，逐渐产生了很强的爱国责任心和民族使命感，矢志为报效国家民族而献身。

辛亥年12月，成都组织了准备北伐的学生志愿军，太玄也是一个踊跃入伍者。他受到了军事训练，正枕戈以待，随时准备北上杀敌。但是还没来得及驰骋沙场时，清朝皇帝便退位了。

同年，周太玄在石室中学毕业时，四川有志的青年学生，为了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纷纷冲出三峡，奔赴北京、上海等地求学。他与挚友王光祈相约，无论在何艰难情况下，也要实现这一愿望。但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家庭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仅靠借贷和亲友的微薄资助，便于1912年3月冒险赴沪，考入了“中国公学”政治经济专门部，由于无力缴纳学费，曾徘徊于校门之外。后得师友胡政之、胡选之的帮助，始得入学，并以自己挣得的稿酬，勉强维持了四年的学习生活。尽管历尽艰辛，他总不失其乐观进取精神。在同学许德珩、冯友兰等人的回忆中，对他的坚毅勤奋、才艺卓绝，都极表嘉许。

1916年，周太玄在中国公学毕业后即在上海《民信报》担任翻译、编辑等职务，并兼任《川报》驻上海记者。后又至北京担任《京华日报》、《中华新报》编辑及“中华通讯社”通讯员。不久，他中学时代的好友王光祈也由中国大学毕业，经他介绍也担任了《京华日报》编辑。他们日间采访，夜晚编辑。由于新闻工作接触面宽，他们对当时社会的了解日益深刻。列强的觊觎和宰割，军阀的腐败和贪婪，大众的困苦和愤懑……这幅内忧外患交织而成的社会图画，使他们日夜不安，开始痛感改革之必要。

在此期间，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也由日本返回祖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主编《晨钟》副刊。太玄、光祈等结识大钊后，深深敬仰他的学识渊博，为人宽厚，谦和可亲，将他视为“知心的老大哥”和道德方面的典范，彼此过从甚密，志趣契合。一致认为要实现改革社会，挽救祖国危亡的宏愿，需要建立一个组织，于是筹划组建“少年中国学会”。太玄后来在回

忆录中，曾以他诗人的笔触写道：必须“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这便是他们成立该学会的主要动因。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他们规定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学会要求会员要“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以实现学会的旨趣。1918年6月30日，即在北京顺治门（即宣武门）外的岳云别墅，举行了由李大钊、王光祈、周无（即周太玄）、陈育、张尚龄、曾琦、雷宝善等七人参加的发起人会议，决定该会由王光祈任书记，李大钊任编辑，年纪最轻的周无（太玄）任文牒。此后又经过一年的筹备期，直到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便正式成立。会上，根据李大钊的提议，又将学会的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从而把学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向前推进了一步。

少年中国学会国外的会员，以旅居法国者为最多。1921年3月27日，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成立，太玄当时已赴法国，当选为巴黎分会书记。其时在东京、南洋、纽约等地的会员，都由巴黎分会联系。巴黎成为留居各外国的中国学生的联络中心，周太玄在法所创办的“巴黎通讯社”又是巴黎的联络中心。可以说他在当时国外的会员中，是一个起着重要组织联络作用的核心人物。

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来的共产党员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沈泽民、黄日葵、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杨贤江、侯绍裘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会员和积极分子。在会员中，也有少数人后来成了国家主义者和青年党的党魁，如曾琦、左舜生等。还有一部分人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教育、文学等方面，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周太玄便是其中之一。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中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它在政治上曾震撼一时。后来虽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但它的历史，反映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路程。

鸦片战争以后，祖国屡受帝国主义侵略、蹂躏的屈辱历史和辛亥革命后人们对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希望破灭，使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仍在苦苦求索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道路，他们把目光转向国外，希望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以振兴贫弱的祖国，不少人开始到海外留学了。

1917年3月，当周太玄还在北京时，有一天，他忽然在报上看到“华法教育会”代招华工往法国前线服务的广告，认为这是一个外出求学和了解世界的最好机会，便立即前去方家胡同该会接洽。一位负责人十分亲切地同他谈了话，这人便是老同盟会员吴玉章。在详谈了一切情况之后，吴劝他先加入华法教育会学习法文，以便将来可以充当华工翻译。这样，太玄便和华法教育会发生了联系，并在报纸上为它发一些消息，同时开始学习法语。

翌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周太玄到了上海。不久便听到德国投降的消息。交战的30多个国家，在厮杀了4年之后，带着长期难以治愈的创伤，把这场人类空前的浩劫暂时结束下来。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了。中国人民密切注视着，希望中国代表团在这次和会上，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争回国家丧失的权益。国内的人们心急如焚，翘首等待着大洋彼岸的消息，这时周太玄燃起了立刻去法国的希望。于是他一面积极地同上海各报馆接洽，由他在巴黎为其供稿之事；一面以预支的一点特约稿费，购下了一张廉价船票，于同年2月1日（正是旧历的正月初一）搭乘一只邮轮前往法国了。

为了将巴黎和会的可靠消息迅速地发回国内，需要尽快地办起一个通讯社。周太玄在国内时，华法教育会的李石曾先生便经常和他商讨在欧洲办刊物的事，他出国前，又写信和留居香港的

吴玉章以及先赴法国的李石曾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于是，他到法国后，就把“巴黎通讯社”很快办起来了。起初是由太玄和李璜合办（当时李璜尚未建立青年党），后来又约请李劫人、何鲁之等到法国合办。从采访、翻译、编写到印刷发行、财务等都由他们承担。3月底便开始向国内发稿，每周一次，有“长篇连载”、“要闻杂志”、“每周日报”等栏目。这些稿件，京沪各大报纸无不采用。

由于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和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被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拒绝，全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4月，巴黎和约又拟承认由日本继承德国在我国山东侵夺的权益，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周太玄等主办的“巴黎通讯社”一得到消息，便连夜工作，抢在英、美、日等国之前，第一个将这一消息传到国内，由各报馆披露出来。中国作为参加协约国作战的“战胜国”，反而受到了比鸦片战争时更深的屈辱，我国人民愤怒了，不久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人们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北洋政府的卖国政策。慑于这种压力，北洋政府代表才未敢在和约上签字。与此同时，周太玄也向四川发回了许多关于“巴黎和会”的消息，由李劫人（当时尚未赴法）所主持的《川报》作了及时的报导，对四川的反帝反北洋政权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后来周太玄非常自豪地称“这是巴黎通讯社事业的顶点”。《大公报》首脑之一的胡政之曾对人谈起他创办“国闻通讯社”，就是因见到“巴黎通讯社”对国内新闻界所产生的进步影响，受到启发才搞起来的。

在国内新思潮的影响下，1919年底，周太玄又开始创办《旅欧周刊》，并筹办《华工周刊》。《华工周刊》于第二年开始出版，并改为《华工旬刊》。《旅欧周刊》为周太玄主编，大部分文章是他所写，上面大量刊载了宣传讨论勤工俭学、工读主义、华工状况以至社会改造等方面的文章，此外关于青年的学业、恋

爱、婚姻等等问题也无不涉及。《华工旬刊》由周太玄和李立三、赵世炎一起创办，是主要反映华工生活的刊物。周太玄在北京时原拟作为华工赴法，后又拟充任华工翻译。到法国后，他时时注意华工情况，又因“巴黎通讯社”和《旅欧周刊》都设有华工状况的栏目，采访工作也需要他常到华工中去。于是他经常为华工们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始终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太玄后来在他的回忆中谈到，华工运动只有在同勤工俭学生中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组织结合之后，才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周太玄在法国一面创办刊物，一面还到巴黎大学听课，最初学数学，后来改学生物学。1920年，他的女友王耀群也从成都到达巴黎勤工俭学。她是这一年赴法的18位女生之一。就在这一年，周太玄结束了办刊物的工作，偕耀群同到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城，先后进入了古老的蒙彼利埃大学。周太玄攻读生物学，耀群攻读药学。太玄一向长于文史，但他说这时“决心测验自己是否能学自然科学”，他认为自然科学对国家社会更为实际，适合需要。不久，他（她）们就在这里结婚生子。周太玄靠自己的一支笔，维持着他和妻子的学业及一家的生活，他（她）们深信，勤以做工，俭约自持，奋发求学，以坚强的意志，与生活中的困难作斗争，就一定能奔向成功之路。

1924年，周太玄在蒙彼利埃大学毕业，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后，便到巴黎大学研究院，开始从事科研工作。在这年至1928年，他不断地来往于蒙彼利埃、巴黎和西部海滨实验室之间。1928年，王耀群读完了药科后，夫妇二人一同回到巴黎。在巴黎的两年间，周太玄加紧了研究工作。在细胞学、腔肠动物尤其是对水母的研究方面获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以我国的松滋侯墨解决了细胞器的染色问题，证实了它的存在。四五年之中，他曾分别在法国科学院、法国动物学会、法国生物学会的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有质量的研究报告、论文和所绘的详图，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

位。在此期间，王耀群也获得了药学博士学位。时隔20年后的1949年，在苏联出版的《下等动物胚胎学》中，还引用了周太玄制作的详图和他的文字叙述，足见当时他在生物学科研上所达到的水平。

1921年至1930年这10年中，周太玄在法国学习和搞科研的同时，还写了6部专书，收在万有文库第一集中，又翻译了3本专书，并撰写了几十篇通讯。

1930年11月，周太玄婉言谢绝了巴黎大学研究院的热情挽留，应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先生之聘，携眷回国，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动物学讲座的名义，同时在成都大学和成都师范大学任教。1931年，成都的三个大学合并，成立四川大学，他又被聘为教授兼生物系主任和物理学院院长。与此同时，王耀群也受聘在华西大学任教。

周太玄自青年时代即重视教育工作，曾著译过许多有关论文。他在川大教授过“无脊椎动物学”、“胚胎学”、“细胞学”、“遗传学”、“动物生理学”、“生物学概论”、“生物哲学”等多学科，因他学识渊博，基础深厚，教学内容充实精当，教学态度严肃认真，又熟谙教学方法和讲授艺术，学生们赞誉说：“听周老师授课，堪称是一种艺术享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又起，在成都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周太玄为山河残破，国势衰颓，社会腐败无比痛心。1935年慈母与爱妻又相继去世，周太玄遭受了沉重的精神打击。为了重新振作起来，他利用休假再度旅欧考察。同时，他曾为《大公报》、《国闻周报》写过多篇杂感和通讯，对当时积弊日深的中国社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抨击。他深感在这样的社会中，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对国家民族、救亡救贫都很难起到应起的作用。于是他归国后，又开始暗暗研究马列主义著作，学习俄语，为救国救民进行新的探索。

1939年，周太玄因反对国民党中央委员、CC系的程天放

任川大校长而毅然罢教离职。1940年，他任西康经济研究所所长后，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钻研了《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和一系列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和当时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接触频繁，过从甚密。在思想政治上得到许多新的启发。1942年，再度回到川大任教，因其深孚众望，被选为教授会主席。

194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桂园宴请民主人士，周太玄三次被邀，得以会见中共的高级领导人，进一步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和启迪。同年，周太玄又受聘兼任上海《大公报》顾问，不断往返于上海成都之间。其时，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还在上海马斯南路约见过太玄，就党所拟就的宪法草案听取了他的意见。

1948年至1949年间，是旧《大公报》新生的时期。周太玄曾致函王芸生，就《大公报》的方向、前途指出：“人民对统治者已经绝望，”“未来之一二年是整个国家重大转变之年，……希望《大公报》能以新的姿态出现。”随即他先到上海，再至香港，担任香港《大公报》顾问，并主持社评委员会工作。以他与《大公报》多年来的关系和影响，对该报言论开始站在人民一边做出了贡献。太玄作为一个左派文化人，在团结民主进步人士的工作方面，也发挥过积极作用。

1950年，和周太玄长期相爱的著名女律师喻培厚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们选择了5月5日这天马克思诞辰纪念日，正式结了婚。

同年，周太玄被安排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文教委员会委员，并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此后，连任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直至去世。1951年9月，他担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9月，又出任重庆大学校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调往北京，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自1955

年开始又兼任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他还于1953年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曾任该党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

周太玄填补了国内水母研究的空白，被称为我国研究腔肠动物的鼻祖。他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后，曾组织和带领科研人员从鸭绿江口到北海市，对我国沿海地区水母分布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前后花了两年时间，采集了大量标本。此外，还参加了国际合作的调查。仅在他及其学生黄明显共同撰写的《烟台水螅水母类的研究》（载《动物学报》1958年10卷2期）一文分析研究的水螅水母类中，就有25种是我国第一次记载，4种是太平洋地区第一次记载。他为我国此项研究工作开辟了新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

周太玄因是中国科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在党的领导下，曾为建立新中国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出版社，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治学谨严，工作深入，有远见，有抱负，主张编辑工作与科研工作相结合，鼓励编辑人员深入研究室，提倡同科学家交朋友；同时，注意组织编辑人员的业务进修，努力培养高素质的编辑队伍。他曾主持编辑出版了《世界科学译丛》，在建国初期对我国科技工作很有参考价值。他还主编了《中国动物图谱》，出版了《动物志》和《建国十年科学成就丛书》等，这都是一些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大影响的科技书籍。他为我国科技出版事业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周太玄教授于1968年7月23日不幸在北京病逝，1978年12月2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注：本文史料来源：

①《国闻周报》所载《海天论语》，

②《书影》出版说明；

- ③ 周太玄简历； ④ 《反正前后》（郭沫若著）；
 ⑤ 《五四时期的社团》第539页和“少年中国学会”部分；
 ⑥ 《五四时期刊物介绍》第三集；
 ⑦ 周太玄致王芸生信件； ⑧ 周太玄追悼会悼词。

（1985年6月撰初稿，1988年初改定）

关于《民盟在成都地区活动纪要》的补正

廖友陶 张大昌 郭 晓

我们合作初步整理的《民盟在成都地区活动纪要》一文，在《成都文史资料》1988年第1辑（总第18辑）发表后，承蒙民盟内外很多同志热情关怀，提了不少宝贵意见，指出了一些差错。我们准备再稿时认真加以修改。现仅先作如下必要的更正。

1. 第90页倒2行和第117页8行“刘坤南”应为“刘堃南”。
2. 第94页9行末“成员”应改为“参加活动”，同页11行末，“每两周开大会一次”应改为“积极参加活动”。
3. 第100页11行中的“赵锡骅、贺新民”应删去，并在“各界知名人士之后添加“及学生”三字。
4. 第105页8行末“彭”字应改为“吴”字。
5. 第111页28行至112页7行，这一段因史实待查，引文亦欠准确，应予删去。
6. 第114页24行“银元3,000元”应改为“金元券3000元”。
7. 第115页18行“张铤珍”应改为“张铁铮”，同页19行“王泽济”应改为“王泽沛”。
8. 第116页20行“孔有员叔苑”应改为“员有孔叔苑”。
9. 第117页中记述的某些史事尚待查证；同页27行“范朴斋同张在渝”应改为“范朴斋同张松涛”。
10. 第124页27行“冯光熙”应改为“胡克林”。

其余补充史料，我们珍存，以备民盟市委编定《民盟成都地区大事记》时参考使用，谨致谢忱。 1988年6月17日